

人病

里。我笑着对被请的那位领导说：“我现在和你一样了，你平时是一副眼镜，我也是一副眼镜，批文件又是另一副眼镜。”吃罢了，我叮咛妇人要将我的碗筷蒸煮消毒，妇人说：“哪里，哪里。”我才出门。却听见一阵瓷的破碎声，接着是撵猫的声，我明白我用过的碗筷全摔破在垃圾筐，那猫在贪吃我的剩饭，为了那猫的安全，猫挨了一脚。

这样的刺激是我实在受不了，我开始不大出门，不参加任何集会，不去影院，不乘坐公共车。从此，我倒活得极为清静，左邻右舍再不因我的敲门声而难以午休，遇着那看不见的人数米外抱拳一下就敷衍了事了，领导再不让我为未请假的事一次又一次写检讨了，那些长舌妇和长舌男也不用嘴凑在我的耳朵上是是非非了。我于遇到任何难缠的人和难缠的事，一句“我患了肝炎”，便是最好的遁词。

妻子说：“你总是宣讲你的病，让满世界都知道了歧视你么？”我的理由是，世界上的事，若不让别人尴尬，也不让自己尴尬，最好的办法是自我作践。比如我长的丑，就从不女性面前装腔作势，且将五分的丑说成十分丑的丑，那么丑中倒有它的另一可爱处，相声艺术里不就是大量运用这种方法吗？见人我说我有肝病，他们防备着我的接触而不伤和气，我被他们防备着接触亦不感到难下台，皆大欢喜，自践难道不是一种维护自己尊严的妙方吗？

再者，别人问起：你这些年是怎么混的，怎么没有更多的作品出版，怎么没有当个 $x \times x$ 长，怎么没能出国一趟，怎么阳台上没植花鸟笼里没养鸟，怎么只生个女孩，怎么不会跳舞，没有情人，没一封读者来信是姑娘写的？“我是患了肝炎呀！”一句话就回答了。

但是，人毕竟是群居动物，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不仅无限的孤独和寂寞。唯有父亲和母亲、妻子和女儿亲近我，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。他们越是待我亲近，我越是害怕病毒传染给他们，我与他们分餐，我有我的脸盆、

我突然患了肝病，立即像当年的四类分子一样遭到歧视。

我的朋友已经很少来串门，偶尔有不知我患病消息的来，一来又嚷着要吃要喝，行立坐卧狼藉无序，我说，我是患肝病了，他们那么一呆，接着说：“没事的，能传染给我吗？”但饭却不吃了，茶也不喝，抽自己口袋的劣烟，立即拍着脑门叫道：“哎哟，瞧我这记性，我还要出去办一件事的！”我隔着看见他们下了楼，去公共水龙头下冲洗，一遍又一遍。似乎那双手已成了狼手，恨不能剁断了去。末了还凑近鼻子闻闻，肝炎病毒是能闻出来的吗？蠢东西！

有一位爱请客的熟人，隔天半月就要请一次有地位的人，每一次还要拉我去作陪，说是“寒舍生辉”，这丈夫就又要了我，夫人当然热情，但看出她眉宇间的忧愁，我也知道她的为难了，说，多给我一个碟一双筷子吧，我用一双筷子把大盆的菜夹到我的小碟里，再用另一双筷子从小碟夹到我口

毛巾、碗筷、茶几，且各有固定的存放处。我只做我的坐椅，我用脚开门关门，我瞄准着马桶的下泄口小便。他们不忍心我这样，我说：这不是个感情问题。我恼怒着要求妻子女儿只能向我做飞吻的动作，每夜烧两盘蚊香，使叮了我血的蚊子不能再去叮我的父母，我却被蚊香熏的头疼，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的心在悄悄滴泪，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洗我的衣物，用高压锅蒸或熏我的餐具，我似乎觉得那烫泡的，蒸熏的是我的一颗灵魂。我成了一个废人，一个可怕的魔鬼了。

我盼望我的病能很快起来，可惜几年间吃过几篓中药、西药，全然无济于事。我笑自己一生的命运就是写作挣钱。我平日是不吃荤的，总是素食素菜，如今数年里吃药草，倒怀疑有一日要变成牛和羊。说不定前世就是牛羊所变的吧。

我终于住进了传染病院。

病房里，我们像囚犯一样要穿病服，要限制行动于一个极小的院子里，虽然那院墙是铁制的栅栏，可以看见外边的人。但看了外边行人穿着花花绿绿行走，就顿生列入另册的凄惨。我们渴望自由，每天打过吊针之后，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，看涌动的云，弄着嘴唇逗引栅栏外树上的小鸟。小鸟却飞去了，落下那一根或两根的羽毛，我们皆如年节的小孩抢拾炮仗一样去抢个不亦乐乎。这行动被栅栏外的一个孩子瞧着，那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在动物园看笼中动物的神气，他竟大胆地走近了几步。他的母亲，一个肥胖的女人就喊：“走远点，那是传染病！”这话使我潸然泪下，我只有背过身去，默默地注视着院中一片玫瑰花，和花坛上的一群黑色的蚂蚁。啊，美丽而善良的玫瑰不怕传染，依旧红花如血，勇敢的蚂蚁不怕传染，依旧在为我们表演负重的远距离运动。这一个夜晚我们皆要等到很晚方回去睡，那依旧洁白的月亮，它随我们到了栅栏里，它不嫌弃。

我们最不喜欢看到的是栅栏角上的那一个蜘蛛网，它好大，状若一个筐

篮，为我平生之少见。我们傍晚用竿子挑破它，第二天，它又完好无缺，像一个个通了电的铁网，又像是监视我们行动的雷达。我们无可奈何，开始产生了一个恶毒的念头，后悔我们为什么要声张自己是肝炎患者？为什么要来住传染病院？人们在歧视我们，我们何不到人群广大中去，要吃大桌饭，要挤公共车。要进影剧院，甚至对着那些歧视者偏去摸他们的手脸，对着他们打哈欠，吐唾沫。那么，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，他们就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了！

病院中的人都是面黄青黄，目光空洞，步履虚弱。看着他们的形象我也知道自己的模样。我们是忌讳用镜子的，但我们对黄色并不反感，黄在中国是皇帝的象征，于世界也是流行色。于是我们都显得亲热，在过道上，院子里，谁和谁见了都要点头，微笑也随之绽开，似乎我们有缘分，数十年前就认识似的，互相询问名称和单位。

医生和护士是从不唤我们姓名的，直呼床号。世界上叫号的只有监狱和医院。我先是“+235”后一个病号出院了，我正式成了“235”。“235！235！”这是在卖饭了，饭勺不挨着我的碗，热汤几次就淋在我的手上，“235！235！”这是护士在送体温表了，她们查看了温度便去我们看得见的地方洗手。我先是极不习惯这种代号，但后来想通了，“贾平凹”不也是一个代号吗？虽然235不是爹娘为我起的名字，可现在满社会不是都在叫“张书记”“李主任”“刘主席”吗？

我在打吊针的时候，目光一直是看着天花板的，天花板很洁净，而我还是看出了上面的细小的纹路，并且从这纹路上看出了众多的鱼虫山水人物。有人说，天花板是病人的一部看不完的书，这话真对。然后我在琢磨“+235”有个“+”号，这是不吉利的，因为乙肝之所以是乙肝，就是各项指标是阳性，阳性表示出来就是“+”号。待到正式为“235”了，我思索235为数相加是10，这还好不是13，但10也是不好，应该是9恰好，围棋的最高段位不就是9吗？中国人是爱好3、6、9的，幸喜有个3字。

在医院的西楼角，也即在厕所的旁边，是有一棵古槐的，古槐的树杈上白天常见到卧一个猫头鹰。每到夜里，它就叫了，它一叫，我们都惊慌起来，肯定在第二天，最迟不超过第三日，定要抬出去一个的。这不是迷信，一定是猫头鹰闻着了欲亡人的气息在鸣叫。大家都走出来，默默地注视着，一定裹着床单的躯体去太平间。他永远太平无烦恼痛苦了。他的毛巾、牙具被拿出来放在窗台，他的母亲或者他的妻子在地上滚着哭。那条床单也折旧永远归了他。他或许不忍心家属的啼哭，或许满意这床单的便宜，或许在向我們作别，这时候，有许多苍蝇在嗡嗡飞，那一只只是他的灵魂所变呢？我们无声地祈祷他灵魂安妥，却不愿有苍蝇落在我们身上。从此，我们皆害怕猫头鹰，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诅咒它，更没有人动手去打它，甚至连这个念头都不曾有。当一日数次去厕所经过古槐下，都不自觉地往树杈上看看，那是惊慌的一看，也是盼望的一看，我们在心中默默地向它祈祷，企望它能饶恕了自己。我至此方明白了人人恨阎王却还给他修庙塑像称他是阎王的原因，而猫头鹰也应该是称作爷的，也该是有庙和塑像的。人怕什么，又奈何不了，人就想着法儿去讨好、去供奉，这就是世上神的产生。猫头鹰也就是一个神的。

在这个监狱似的天地里，我们这些病人是互不歧视的，他同监狱的区别正在这里。犯人是要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而争取减刑，这是因为他以前曾经“犯”过人，以犯人人狱，又以犯人减刑入狱。我们患了病，并不是企图犯人，入院的一半是为了自己，一半也是为了不犯了别人，所以我们互相关心，体贴。每有一个出院，我们欢欣庆祝他的康复，也为了自己能治好而增加自信。每有一个入院，我们多半却为他传染了病而悲伤。我们欢迎他的仪式虽不是握手和拥抱，却提醒他怎样买饭票，怎样服药，怎样不必悲观，病友和学友的感情一样珍贵，有待我们统治治愈出院后，我们在社会上仍可以形成一个关系网，这个关系网是受歧视之下、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建立的天长地久的友谊，他比那些互为利用的官网、情网、乌七八糟的网纯洁高尚得多。

我们失却了社会所谓的人的意义，我们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，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怜悯心，理解了宽容和体谅，热爱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，体会了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。说老实话，这里的档案袋只有我们的病史而没有政史，所以这里没有猜忌，没有幸灾乐祸，没有勾心斗角，没有落井下石，没有势力和背弃。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是乙肝病毒。男女没有私欲，老少没有代沟。不酗酒，不赌博，按时作息，遵守纪律，单人单床，不嫖娼，贵贱都同样吃药，从没人像官倒爷那样贪婪而嗜药成性。医护是我们的菩萨，我们给他们发出的笑是真正从心底来的，没有虚伪。猫头鹰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畏惧而崇拜，没有丝毫的敷衍。我们为花坛中的那一片玫瑰浇水除草，数的清那共有多少花瓣，也记载了多少片落花被我们安葬。那洞穴的蚂蚁和檐下的壁虎，我们差不多认得了谁是谁的父母和女儿。我们虽然是坏了肝的人，但我们的心脏异常得好。

据说，在我们中国，患乙肝的是十个人中有一个或两个的，我们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偶然的体检时发现病的。所以，当我站在铁栅栏内向外张望那些歧视我们的人群时，总是想：别神气十足以为你们干净吧，或许，你们是没有查出乙肝的病人，我们是查出了乙肝的健康人！中国人这么多，如果逐个检查一下，这里就是一个多大的世界了，那么，都能来这里等待，人际的感情恐怕比铁栅栏之外要好得多呢。

我们是病人，人却都病了，我的猫头鹰上帝！